

崇州市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崇州市委员会
编

主 编：李世源

副主编：陶遵科

编 委：雷志华 杨文泽 陈柏青 毛甫澄

王明渊 魏晓渊 施叔新 柴雨霖

目 录

活捉黄光辉 铲除“元通国”

——回顾崇庆县解放初期的剿匪斗争……	梁进学 (1)
著名新闻工作者龚选舞……	龚选俊 (31)
崇庆县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向新才 (40)
拾金不昧的吕天伟……	马世勋 (58)
崇庆县抗美援朝运动纪实……	杨文泽 (67)
回忆在西藏工委工作的日子……	王振垣 (76)
崇州御匪纪实……	王明渊 (82)
清队沉浮记……	雷志华 (93)
记道教音乐的两位杰出人物……	叶荫根 (106)
天主教在崇庆县的过去和现在……	<u>傅敬仁</u> (108)
回忆在省委农村工作检查团的一个月……	柴雨霖 (113)
诱捕特务骨干任炎民……	卓朗天 (116)
崇州风味食品揽胜……	陈柏青搜集整理 (119)
解放前的崇州茶馆……	毛甫澄 (125)
关于张露萍烈士早年身世的调查 崇州市市志办公室	(129)
我的片断回忆之二……	孙味棋 (150)

活捉黄光辉 铲除“元通国”

——回顾崇庆县解放初期的剿匪斗争

梁 进 学

一、题 记

说起崇庆县（今崇州市，下同）三十六万人民（解放初期全县人口数）的解放，就必然要说到1951年上半年那场紧张而又激烈的剿灭黄光辉匪帮的斗争。我在第一线参加并经历了这场斗争，但由于当时所处的位置和角度不同，能尽窥这场斗争的全景，也不可能亲历斗争中的所有细节。事后的数十年间，我和不少共同参加过剿匪斗争的同志，不时回忆起那难忘的岁月；也有幸多次接触到过当时剿匪部队的一些同志，听他们谈到了一些我未能见到过的具体情节。在79师工作过的，我的舅父李建唐同志（已于1914年初去世），他多年从事收集和编写军事资料工作，向我先后提供了他们部队当时在川西剿匪，特别是活捉大匪首黄光辉的具体文字资料。我还参阅了县志办同志写的一些书面材料。这样就使我能够把事关崇庆人民真正得到解放的那场剿灭黄光辉匪帮的激烈斗争大致勾画并记录出来。面对今天的幸福生活，让后人知道这一段历史事实，定会有所思。对在剿匪斗争中牺牲了的同志，也是一个很好的纪念。

二、初识“元通国”

对于参加进军大西南，解放四川的同志来说，我们不少人有两个“没想到”：一个是没想到蒋介石、胡宗南几十万大军垮的那么容易，兵败如山倒，几乎没有怎么打，就全垮了；再一个是没想到胜利之后，又经历了那么一场残酷而又激烈的剿匪斗争。川西各县的革命烈士陵园里，埋葬的几乎全是剿匪中牺牲的同志。

1949年12月的中下旬，十八兵团在前，我们西南工作团在后，以日行九十至一百多里的速度，翻越秦岭和大巴山，于12月30日进入成都。按照事先分配到各专、县工作的同志，也马不停蹄地分头到所去的专、县。

1950年1月1日，军代表（县委书记）张敏，县长姚体信和张竞、庞汉元、茹彬、茹宪瑞、金培仁、李克耻、王建毅、张保生、郝若愚、郝维章、武勇、刘官海等首批十四位同志到达崇庆县，宣布实施军事管制。1月7日，我和姜杰、崔桂林、何子清、史文进、李忠雄、齐新民七人接着步行到崇庆县。我们这21个人，全是西南工作团的，但都穿着佩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的军服。我们后到的几个人，头几天就住在县府大堂前东厢房的地板上。

此时，崇庆县存在着一个叫做“崇庆县解放委员会”的机构，就设在原县政府，主任委员是大恶霸、伪县参议长，曾被伪省主席王陵基在1949年10月16日委任为反共救国军师长的黄润琴。他们也有公开的军事组织，就是黄润琴的反共救国军的原班人马，在成都解放前十天，于1949年12月20日摇

身一变打出了“川西南人民协作军”的旗号。这个“协作军”由国民党军队原旅长黄鳌为司令，黄润琴为副司令。他们自行宣布，“协作军”起义，崇庆县于12月21日和平解放。我们到达崇庆县后，1月9日，军事代表张敏命令宣布“协作军”复员解散。1月12日，崇庆县人民政府成立，同时宣布所谓的“解放委员会”结束。但我们仍看到黄润琴还在县政府内人摇大摆地走来走去。据说，过去国民党派来的县长，都要先拜“元通国”黄家这个“码头”，才能坐得稳椅子。黄润琴在12月26日我军即将进入成都之际，还公然叫嚣：“就是共产党来了，也要通过本地人才能把事情办通”。但我们共产党、解放军偏不买他这个帐。黄润琴也很快意识到事情不妙，便暗中疏散了贵重财物和家小，并于1月27日偷偷溜回到他的老窝“元通国”，与他的侄儿黄光辉密谋策划攻打解放军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去了。

这里要说一下崇庆县怎么会有一个“元通国”？元通，是距崇庆县西北方向二十多华里的一个较大的集镇，紧靠西河，一条主街三弯九倒拐蜿蜒两、三华里，很是繁华热闹。街上居住的黄家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期间，两辈人中即出了几个“大人物”：一个是“老旅长”黄润余，一个是“新旅长”国民党立法委员黄鳌，再一个就是控制、操纵了全县的反动党、政机构，身任县参议长，封建袍哥组织“唐安总社”头子的黄润琴。他们的侄儿黄光辉，1934年18岁时就当上了国民党军队的团长，曾截击我北上抗日的红军，1939年，又任元通场袍哥“景福社”舵把子。他仗其父辈权势，巧取豪夺，有田数百亩，公馆两幢，豢养着荷枪实弹的匪徒三百余名，又充当着李子明、周四维、彭献廷等匪首的后台，还勾结着

茂、汶一带匪首宋国太等，干尽了贩卖鸦片，抢劫百姓及过往客商的罪恶勾当。川西解放前夕，黄光辉同三江镇的大匪首李泽儒等参加了蒋介石在成都军校办的“游干班”，建立了武装暴乱的核心组织“设计委员会”。1949年12月21日，（正是这一天，黄润琴在城关打出了“崇庆县人民解放委员会”和“协作军”的旗号），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率残部逃窜到崇庆怀远一带时，黄光辉带匪徒亲自护送，王陵基当面委任黄光辉为反共救国军团长，次日又改委黄为师长，并赠送机枪三十挺，步枪五百余支，“关防”大印一枚。1950年1月上旬末，“协作军”被我军事代表宣布解散复员后，黄光辉有计划地将该部千余人、枪“沉入乡间”，“待机行动”，准备武装暴乱。1月30日，黄润琴从元通潜往成都与黄骞会合。2月上、中旬，黄骞和黄润琴都曾派专人向黄光辉送信通消息，出谋划策。此时，川西区党委统战部长李宗林，通过崇庆县人、“民革”的宋武吾先生向黄骞、黄润琴发出警告，要他们传话给黄光辉，不要自走绝路。但二黄态度蛮横，不为所动。黄光辉按照王陵基和“二黄”老辈子的旨意更是加紧活动，接连召开秘密会议，既同周围各县准备暴乱的匪首联络勾结，又组织本县各乡镇的反动乡镇长和大小匪首加快暴乱的准备。种种迹象表明，极端反动的“元通国”之王，绝对不会自动失去他们的天堂，正在磨刀霍霍，要向新诞生的红色政权扑杀过来了。

我们到崇庆一放下背包，就在军事代表张敏同志的领导下，参加接管工作。开始搞接管工作的人很少，加上地下党陈万堂、段贵纲他们，也只有三十来个人。我分到文教部门搞接管。县委宣传部长兼教科科长张竞，正准备在县女中集

训全县的中、小学教师，就叫我独自一人到县民教馆和县立中学去接管。我先去县民教馆，听了馆长何学培的汇报，看了馆内情况，就叫他把图书馆先贴上封条，等清理后再开放，博物馆和公园仍照常开放。然后到县立中学，校长卫佑真汇报了学校情况，引我看了学校的设施，我只说了学校的领导人员等县人民政府任命，公民课取消，图书馆未清理前暂时封闭等事情。

一月中旬，川西北军政委员会连续发出征粮工作的紧急指示，为解决入川数十万部队，国民党起义数十万部队，接管旧政府大批人员和城市数十万市民的粮食供应任务，要求把征粮工作作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我军各部队也同时抽出大批中、下级干部，下到各县的农村搞征粮工作。派到崇庆县征粮的我军营、连、排、班干部，约百人左右，他们连同我们南下到崇庆工作的部分干部一起，又带了一些本地刚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组织了十多个征粮工作队，分头下到全县农村进行征粮。县上也派我下去参加征粮工作。我带着南下时的背包和三八式步枪，过了西河，到朱氏街粮食仓库住下。我们这个工作队只有六、七个人，除部队下来的王有才同志和我是穿军装的外，其余几个都是新吸收的本地青年学生和一个小学教师侯涵清。我们只负责合兴（现西江）和济协两个乡的征粮任务。

此时，国民党的基层政权机构还原封未动。我们遵照上级指示，控制使用原乡保人员，要他们按照我们“粮多的多征，粮少的少征，无粮的不征”等一套政策来完成任务。我们工作队分工，王有才主要抓合兴乡，我主要抓济协乡，每天早出晚归，白天分头行动，晚上一起汇报研究工作。

济协乡虽然人口只有万把人，但上有济民场，下有协和场，十多个保，拉扯了十来里路长。济协乡的实权派人物是大恶霸地主、袍哥舵把子雷绍华，他当过好多年的伪乡长，和“元通国”黄家勾结很深。1948年，他把乡长职务交给了他的儿子雷家裕。其时雷家裕年龄不过三十，并在成华大学读过几年书，从思想到政治行动却相当反动。他父子二人已同国民党潜伏的特务分子，及黄光辉等土匪武装，有了密切勾结，并在其家中收罗豢养着国民党散兵人枪数十。我每天从合兴到济协，先紧紧控制住雷家裕，和我一同到各保找保长征粮。雷一面应付我，不得不和我一道到各保去，一面又和郭保芝等匪首暗中往来，密谋反革命暴乱。不知是为了摸底，还是别有企图，有一天在乡间小路上走着，他问我：

“你们工作队为啥子只背长枪，不带手枪？”说着撩起长衫子从腰间摸出两支手枪，在两肋下同时用大拇指一顶，子弹上膛，朝树枝上霹哩啪啦一车枪响，树叶纷纷落下，问我：

“这手艺如何？”我说：“只有为人民打仗用枪，才说得上好手艺！”他没有再说什么。而我却已感到：这可是一个需要认真对付的反动家伙啊！晚上回到合兴，我向王有才他们谈了这个情况。没有几天，大约是二月初，县上得到情报，黄光辉、雷绍华等在雷家聚会，商议暴乱。2月3日晚，县上派人包围雷家，进行捉拿，但被雷发觉，雷家裕连夜带上数十人和武器（据说还有两门迫击炮）逃到大邑山区。县上立即派思想进步靠拢我们的本地青年龚选卿来当乡长。为了使保长们服从他管，待龚到后当天晚上，我们工作队带上两挺机枪和其它武器，到济民场召集济协乡各保长开会，宣布龚选卿当济协乡长，要各保长服从他的领导，搞好征粮工

作。当时的工作非常艰巨，乡保人员明拖暗压，快一个月了，我们两个乡才收到20多万公斤公粮。

三、城墙内外，激烈战斗

1950年2月13日（阴历腊月27日），正吃早饭时，我们接到县上紧急电话，通知我们工作队立即回县。我当时还以为是我们回去过大年，但又心里想：过年为什么这么紧急？吃完早饭，我们立即回县，进城后，我未休息即去县女中看张竞（他正在集训全县中小学教师）。这时城外已响起枪声，城门也很快关闭了。原来县上已得到情报，川西各县已经大面积发生国民党特务、土匪和封建会道门等各种反动势力集结在一起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并作了紧急准备，一面通知各征粮工作队立即撤回城内，一面果断决定，把城内的原国民党警察大队全部解除武装，集中控制起来。就在这一天，黄光辉指挥着各路大小匪首、地主恶霸、反动乡保人员带领的三千多匪众，包围了县城北门外一带。匪首雷家裕伙同大邑过来的土匪共一千余人，包围了西门外一带。大匪首李泽儒等正从三江一带准备向东、南门围来。曾当过国民党军的伪旅长王耀祖也配合黄光辉，准备攻打东门，但行动迟缓，攻击不力。

这时，散布全县的十多个征粮工作队大部分都已撤回，而离县城最远的街子乡工作队十一个同志，未及撤回，全部被土匪杀害于怀远、双河等地。白马乡等工作队亦有少数同志在撤退中被土匪杀害。怀远工作队随同驻怀远部队一个连，边撤边打，在元通二江桥头与土匪激战，部队牺牲了二十多人，于县城被围之际，接应回城。我听别的同志说，姜杰在从怀远撤回来时，除武器、背包外，还把工作队伙食团

未吃的一颗几斤重的莲花白，背在身上，边走边打，五十多里路，也未丢掉，一直背回城内。在城内，我军部队仅驻有180师538团团部和一个侦察排、一个炮兵连（有六门八二迫击炮），再加上从部队抽调来参加征粮工作队的同志和我们南下入川到崇庆工作的同志，以及地下党的同志，总共不过三百人左右。在靠近城西北角的驻军团部（即现在的市委机关大院），成立了由县领导和驻军团首长组成的指挥部，统一指挥对匪作战。指挥部决定我们这三百来人，大部分上城墙，少部分在城内维持秩序和守护机关。我们都增发了武器和弹药。在城墙上，每个城门楼都配有一挺重机枪，还赶修了里外两面工事（既能对外打，又能对里打），准备若土匪有内应或者进了城，我们就在城墙上固守，再配合援军歼敌。城西北角西湖塘架着六门八二炮，测好各个弹着点的标尺。城内县政府前面的十字街口中心，也修了一个地堡，里面布置了几挺机枪，可控制四面主要街道。

围城的数千名匪徒，除周四维、李子明及雷家裕所率的股匪较为剽悍顽强外，多数是乌合之众，有不少还是胁迫来的农民。所以我们能以少胜多，打得他们屁滚尿流。2月14日早晨，土匪开始攻城，我守城同志沉着迎击，土匪一阵阵乱吼乱打枪，却不敢近前。当夜我军小分队主动出城出击，除歼敌一部外，还俘虏了一、二十人，交给地下党段贵纲他们突击审讯，获得不少情报。2月2日夜，匪众猛攻北门和西门一带，并抬着竹梯意欲爬城墙，尤其是城西北角，战斗更加激烈，我守城部队待敌人接近时，各种火力一阵猛打，加上迫击炮弹和照明弹齐放，匪徒就慌成一团，除打死的以外，到处乱窜乱跑。我小分队乘机不时出击，杀伤了不

少匪徒。当日，黄光辉的攻城先锋周四维，率领“敢死队”，亲自抱着机枪，猛冲北门，被我炮火击中大腿，造成重伤，大挫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我军乘势冲出北关，连续冲锋，杀伤敌人数十人，俘敌近百人，胜利从北门返回。16日，我军又从西门出击，毙伤匪十余人，俘匪首戴大鵬以下三十余人。2月17日，也就是正月初一，我军180师540团两个营从温江方向前来增援我们，早上从东门进城，上午就出城击溃了北门外的匪徒，但西门外的战斗却异常激烈，一直到太阳快落山才胜利结束。黄光辉匪帮曾扬言：“正月初一要在城内过年”，完全彻底落空了。

在土匪攻城的这几天，我和李克耻、张保生、郝维章四个人，留在县委机关（当时设在小北街县银行一个四合院内）守护文件、电话和机关安全。张敏他们已到指挥部去住了。我们四人都配了长短枪，枪不离身，晚上轮流睡觉，睡时不脱衣服。由于大邑县城被土匪占领，大邑的同志和地下党周鼎文的川康游击队百余人这时已撤到崇庆县城，他们也配合我们作一些维持街面秩序的工作，所以城内气氛虽然紧张，但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事情，我们可以轮流上街走动。围城的第二天，我去指挥部看张敏，他正在草拟标语口号，其中疑有一条是：“乡警队，往后退，我们专打黄光辉！”我怀疑这一条起不到好大作用，因为乡警队基本上是听从伪乡镇头子指挥的。他说：“为了分化瓦解敌人，还是要有这一条”。随后我即从指挥部后而出，经过西湖塘我们的炮兵阵地，从西北角上了城墙，往西门方向走。城墙上挖了不少两面工事，还堆放了一些碗口到水桶那样粗的长圆木。我们守城的同志，并不太多，每隔十来个城垛，只有两人或三人一堆，

架起机枪、步枪，注视着城外。城外的枪声很密，也有阵阵吼声，我们的同志并不多打枪，只是看清楚了，瞄准后再打。我走到西门城楼，见有十多个同志在那里坚守。西门外的城壕内靠城墙原有一排草房已被烧毁，我以为是土匪放火烧的，我们守城的同志说：“为了防止土匪爬城墙有掩护物，影响我们的射击视界，是我们放火烧的，过后再盖起来就是了！”我返回指挥部，向张敏说了我看到城墙上情况，他笑着说：“东面和南面城墙上我们的人还要少，只能来回游动着对付敌人，不过我们布置有疑兵，还有小分队不时出击，敌人弄不清楚我们有多少兵力。”

当时令人恼火的是：拿上钱买不到东西。街上商店基本上都关了门，要买东西就得敲门。我们没有盐吃了，就上街敲开卖盐商人的门，可是人家不要我们的人民币，而我们手里又没有银元，逼得我们给他打欠条，事后再付银元。

2月17日，也就是正月初一，我们的援军从温江一到崇庆，上午就把东门和北门外的土匪打散，逃窜而去，午后即从西河坝包抄过去，会合从西门出去的部队，把土匪压缩在金带街上打。下午四点左右，我出去到西河边和金带街去看，看到街头河边打死的一片有好几十个，街上被打死的土匪也东一个西一个到处都有。这些被打死的土匪，大都腿上裹着毛毡片，脚上穿着麻窝子草鞋，看来是山上下来的惯匪。我走到唐安小学门口，只见对面一座二层楼房里还有二、三十个土匪坚持顽抗，拒不出来交枪。进入这个楼房的过道很窄，我们部队一冲进去即被打中，先后牺牲了四个同志，此时忽然又从房里扔出一颗手榴弹来，把我挨身的一位战士腰部炸伤了。大家气愤极了，决定四面包围住，用炮来

轰。几发迫击炮弹一炸，里面的土匪哄的一下全跑出来，除打死几个外，其余全部被活捉。这时，已近黄昏，整个战斗也结束了。我回到县委机关大院，看到随增援部队来的地委机关的张林超和地区公安处的张荣，正坐在街沿上和张保生等摆谈。我向他们说了西门外的打仗场面，张林超笑了笑说：“看来你们这里比温江还要打得紧张激烈一些。”

四、追剿黄光辉

城关解围后，增援来的我军180师540团大部和538团大部及173师536团一部，马不停蹄，立即转入了对黄光辉等匪部的主动进剿。2月18日，即正月初二，538团两个营，经大罗寺，冲进元通镇，直捣黄匪老窝，次日返回县城。同一天，540团两个营和533团一部，经金鸡大划，追击到三江镇，与李泽儒匪部激战一天多，歼敌近百，予李匪重创，李匪逃到大邑、邛崃一带，屡经我当地驻军打击，遂土崩瓦解，李泽儒本人偷偷藏匿成都。也就是这一天，我军538团一部从西门出击雷绍华、雷家裕及陈楚生等匪部，雷率残部逃到大邑山区，陈辗转逃到东关、万家，与黄光辉会合。至此，县城周围及附近，已无大股匪徒公开活动。

但是，黄光辉这个坚持与我为敌到底的大匪首，并不甘心就此失败，一面加紧同灌县、温江、大邑等地的国民党潜伏特务和聚众暴乱的大匪首多方联络，一面在万家、怀远等地，不断召集所部大小匪首和地方恶霸多次开会，策划“反攻”并抢粮上山，准备“再干”。

在部队数次出城追击近郊股匪的同时，县领导亦组织我

们进行总结和布置下步工作当时，决定的主要任务是坚决进剿股匪和继续开展征粮工作。而进剿的主要打击对象，则是聚集在怀远、万家、三郎一带的黄光辉匪部。为了准备上山下乡，我急需添置一双袜子。这时刚好领到头一个月的津贴一万八千元（旧币，折合新币一元八角钱），我拿到街上，买一双线袜最少得给一万九千元。只好又向别的同志借了一千元才买成。

2月25日，即正月初九的晚上，538团二营的解放军和县委书记张敏亲自带领我们剿匪征粮工作队的三十多个同志（包括地下党员段贵纲带领的三十多个崇大新支队安顺区队游击队员），趁夜深人静之际，悄悄离开县城出发了。出西门，过东关，绕大邑青霞，再转入无根山，黎明前包围了怀远镇。天亮时，我们从东、西、南三门进街，只遇到小股土匪，打死和抓获了一些，其余散逃而去。怀远当地的暴乱匪首除乡警队长杨绍华在西门被击毙外，镇长左文光逃出北门未抓到。我们一进怀远，上午即上街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破除敌人散布的“共产党要开红山”等反动谣言，稳定人心。下午我和史文进出东门，一直走到与无通交界的崇福桥，没有见到几个人，天黑前返回街上。这时我看到工作队的一些同志，正在和张敬政委争吵。原因是当天在怀远河坝的乱石滩里，找到了被土匪杀害的我们街子乡征粮工作队几个同志的遗体，其状甚惨有某被，抢了眼，有的还用木棒从口腔打进腹腔，大家气愤异常，马上要用恶霸地主家里前缀子被盖裹尸，而张敬同志坚决不准，提出要注意群众影响，服从纪律。最后还是说服了大家，把前缀被子的几个川康游击队员又把被子送回原处，仅用白布裹了被害同志的遗体。

为了尽快歼灭黄光辉匪部主力，部队在怀远稍作停留后，第二天即在三郎（今三郎镇，下同）、街子巡迓追剿，我随同前去。到三郎乡乡长杨家翰家和街子乡政府，连一个旧乡政府人员都没有见到，全部闻风而逃。接着部队进山，到万家、苟家和茂县、汶川的水磨沟、三江口一带深山追剿，我们工作队除李忠雄随部队进山外，其余都留在怀远工作。

我们工作队和驻怀远的一个连，继续在怀远街上宣传剿匪的大好形势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并收缴土匪隐藏的枪支弹药。头两天，群众顾虑很大，没有人敢和我们说话。第三天晚上，猪市坝附近卖板鸭的牟海山，才开始同我和王建毅开腔说话。他说“解放军好”。此人虽没有什么工作能力，也无文化，但这是怀远街上第一个敢同我们说话的人，我们很重视，不久就把他安排到镇上工作，以后又调到县上，成立县联社时，又叫他当了副主任。

我们在怀远住了一个多礼拜，张敏和茹彬、段贵纲及川康游击队等大部分同志就回县上去了。因为他们还要开辟其他区、乡的征粮剿匪工作。这样留在怀远的就只有姜杰、王建毅、李元耻、张保生、何子清、齐新民和我等几个南下的同志，另外还有新吸收的十多个知识青年。我们除抓怀远镇24条大小街道上的工作以外，有时也出去下乡到一些保上工作，部队抓回的散匪，也交给工作队进行审讯，以查清匪情。我们从到怀远起，为了应付紧急情况，天天晚上睡觉都不能脱衣服，只能和衣抱枪而卧。这样十几天就开始长虱子，因无换洗衣服，虱子越长越多，我不久就染上疥疮，奇痒难忍。鞋子跑破了，就学着穿草鞋。当时我没有钱，有的同志身上有几个钱也买不成东西，因为街上交易老百姓不要

人民币，只要银元、镍币或者是米。县财政科长金培仁知道这个情况后，发第二个月津贴时，就不给我们发钱了，而给我们每人发两条“双釜”牌低档纸烟，那时我不吸烟，想把烟变成钱，又顾面子不好意思去卖给别人，还是李克耻拉着我，上街把烟相因卖给烟铺子，换回能够买几双麻窝子草鞋的钱。

五、李子明缴械投降

3月上旬，538团部队从汶川、茂县出山后，即转往县城到别处剿匪去了。179师536团在灌县河西石羊场一带剿匪，便派了一个连驻到怀远。这时我们工作团主要是姜杰负责，对外他又担任着怀远区长职务。部队驻在怀远天主堂内，为了和部队随时保持联系，除姜杰、何子清和新参加工作的同志仍然住在区公所内、我和李克耻、张保生、三建毅、齐新民等转住到天主堂隔壁、已被打死的匪首杨绍华的风子里。这座房子已空无一人，有后门和天主堂直通，和驻军往来十分方便。这时，群众也开始有所觉醒，有的还能向我们反映一些情况。其中有个叫杨启贤的，约三十多岁，家在我们住地对面的棕市街上，本人曾教过小学，有些文化，不但能口头向我们反映一些情况，还能写点书面材料送来。

我们到怀远虽有半个来月，但黄光辉匪部尚未受到致命打击。他跑到茂、汶深山区，和潜逃到那里的国民党特务、当地的各大匪首，以及大邑、灌县一些在逃的暴乱匪首，往来勾结，密谋策划，又组织本县和灌县沿山的各乡镇暴乱匪首、恶霸及乡保人员，纠集一起，成立“中国复兴军西南游击军”，发起第二次大规模的反革命武装暴乱。黄光辉指定三郎乡大匪首李子明为司令官，首要目标是攻打我怀远驻军